

资政参考 敬请阅览

视点

第 12 期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2009年7月1日

ZHEN JIANG LIBRARY

本期 导读

- ☆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
- ☆政府缺钱，宜向改革要出路
- ☆以欣赏的眼光看“29岁市长现象”
- ☆可怕的“宁撞公交不撞奔驰”
- ☆松原高考舞弊的警示
- ☆河南欲将文化和旅游结成“并蒂莲”
- ☆省府全省推广镇江经验
- ☆中国的“四十五岁现象”

阅读镇江

镇江名人（二十四）

“东吴史迁”——史学家韦昭（204—273），字弘嗣，史家避晋司马昭讳，改称“韦曜”。三国时吴国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市）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受太子孙和谕作《博弈论》。孙和被废后，为黄门侍郎。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为太史令，撰《吴书》。孙休即位后，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并命如西汉刘向故事，校定朝廷藏书。孙皓即位，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因昭生性精确刚正，不好言嘉应，又不欲为废太子孙和作纪，为孙皓所怒，遂坐他事下狱诛死。遗著甚多，留传至今而又影响甚大者为《国语注》。

《国语》是关于春秋时期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所作，但体例不一，文辞古奥。韦昭广泛参考西汉的贾谊、司马迁，东汉的郑众、贾逵，当时的虞翻、唐固等诸家学者对于《国语》的研究成果，斟酌取舍，更为是正，汇为一编。“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国图库全书总目》统计的韦昭自己创立的训诂有六十七条，并认为“《国语注》存於今者，惟昭为最古”。因此它事实上已经成了集两汉三国《国语》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先秦文化、语言及历史的必读书目。

韦昭的其他历史著作还有：《吴书》五十五卷，是关于三国时吴国的官方史书，陈寿著《三国志》时曾多有采录，《新唐书·艺文志》中尚有著录，今佚。《汉书音义》，是对《汉书》的注解，书已佚，尚有遗文存于李善《文选注》、司马贞《史记索隐》等书中。《三吴郡国志》，当是对吴国所辖郡县户数物产及人文历史的总录，书已佚，遗文仅存两条，见《太平寰宇记》卷九四湖州乌程县“具区”条、“孔姥墩”条。《三国志·韦曜传》中韦昭自称别有《洞纪》三卷，考证伏羲至秦汉年间的历法历象，又欲将吴国黄武以后的历法历象专为一卷，未成。《官职训》一卷，《辩释名》一卷，均为驳正汉代语言学家刘熙《释名》中的错误所作。书皆佚。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省府全省推广镇江经验

记者日前获悉，今年以来，镇江市市委、市政府按照“严谨、高效、创新”的要求，积极构建大督查机制，强化政务督查职能，使督促检查成为促进镇江市又好又快发展的推进器。目前，这一经验已被省政府办公厅明文向全省推广。

镇江市政务大督查机制构建于去年下半年。市委、市政府对市委办、政府办督查职能进行整合归并，建立了“两办”协同抓督查、促落实的工作机制，督查职能更加集中，督查行动更加统一。

在这之后，相关督查部门经常对重大决策部署、重要目标任务、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督查，跟踪督办。及时编发《督查通报》，及时准确地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告督查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今年以来，督查重点关注事关全局工作、事关安全隐患、事关群众生活、事关长效管理等问题。4月初，某苗圃在西气东输管线上违规植树，群众举报长达1年仍未解决。市政府办在督查中，严厉责成相关管理部门认真对待，一周内就将4500棵树全部移植。

就在本月，镇江市基本实现秸秆零焚烧，也充分显示了大督查工作机制的成效。在短短20天内，全市上下各地各级均有分工严密的督查队伍，从领导干部一直到普通党员，层层抓落实，严防死守。

通过一系列高密度、强推动的督查，全市上下沸腾了，定时间、定任务、定进度、定责任人，倒排工期，按时推进，成为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的必然举措；比拼赶超，抢时争日，确保完成上半年的各项目标任务的浓厚氛围正在形成。在此基础上，市政府办公室出台相关文件，明确各级政府、市直各部门是政务督查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志是抓好落实的第一责任人。

群众看干部，干任何工作，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工作机制的某些缺陷，长期以来，使得一些干部如网民所说的：“像一锅温吞水，总是烧不开”。工作没有激情，动力不足。如何煮沸这锅温吞水？方法得当，少许柴火即可；措施不力，再大的火焰也白搭。

镇江市委、市政府一改往日督查与考核职能分散，工作分开的旧制，科学调配资源，把督查与考核紧密结合起来。在督查考核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干部不积极主动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或工作无成效的，及时进行问责并加以处分。干部普遍有了紧张感，压力大增，那种不急不慢，过一天糊一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强督查硬约束，掀起问责风暴。市政府办督查处充分利用通报等载体，及时快捷准确地反映督查动态，通报督查结果，跟踪督查过程，做到透明公正，使干部心服口服。此外，还做到一督查一通报，特别是市主要领导每天再忙都要审批督查通报，采用超常规的手段解决工作不落实问题。

通过今年上半年的高密度，强节奏，硬督查，效果显现：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全年目标任务，以“嗷嗷叫”的精气神，奋力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今年前4个月，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8.6亿元，增长41.4%，其中城镇规模投资增长38.2%、工业投资增长41.2%，增幅分别列全省第一、第二位。

——摘自《新华日报》

镇江推进信息化建设

为加快推进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建设，近日，副市长冯士超与江苏电信公司副总经理王继荣分别代表镇江市政府与江苏电信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政府将在今后我市信息化工作中，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对江苏电信给予支持。江苏电信则将发挥其在网络提供和运营、技术支撑、服务培训等方面的优势，根据我市的总体规划 and 部署，在原有固定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在我市信息化领域和服务性行业通信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力度。

根据协议，双方将本着“政府主导、企业主体、行业推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信息化规划和研究、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应用、信息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努力实现信息网络、信息应用、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良性互动，并将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具体合作工作。

一是以信息化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加强我市的信息化规划和研究，实现全市各行业信息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通过推进农村信息化应用发展，着力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信息化建设步伐，提高电话和计算机普及率等相关小康社会指标，并通过信息化在农村的应用，促进我市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二是以信息化促进产业调整升级。通过加强双方在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中的合作，努力促进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促进我市信息化咨询、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电子商务、通信产品检测等现代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

三是以信息化促进民生显著改善。联合打造阳光政府。推进“数字城市”工程，开展社区信息化建设。为市民提供网上政务公开、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城市应急、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等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四是以信息化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服务“平安镇江”信息化工程，形成基本覆盖全市道路、街道、公共场所、要害部门、公共交通系统、案件多发地段和城乡接合部的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框架。打造“绿色镇江”信息化工程，通过对重点企业、重点河道的远程监控和告警处理，预防污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围绕远程教育、平安校园等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普及活动，提高全市市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摘自《人民网》

科学思维 × 执行力 × 玩命干 = 新跨越

科学思维 × 执行力 × 玩命干 = 镇江新跨越。6月28日下午，在全市纪念建党88周年暨“争当跨越发展排头兵”座谈会上，市委书记许津荣听了6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发言后，提出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方程式”。实际上，今年上半年，无论是市级机关、基层街道，还是企业、村镇，都在用“跨越发展”的实践印证着这样一个方程式。

去年我市提出“实现镇江发展新跨越”奋斗目标后，广大市民发展的心更齐、力更足。今年前5个月，我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全省第一，经济运行回稳提升、环比逐月趋好，城乡建设全面提速、城乡面貌积极变化，这些都反映出我市跨越发展的态势初步显现。

跨越大潮中，我市涌现出以新坝镇、天工集团、金东纸业、金山街道、宝华镇和平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为代表的一批“争当跨越发展排头兵”。他们或咬定第一的目标不放松，或立志打造世界强企，或适时科学应对金融危机，或努力实现和谐拆迁。

“党的先进性，在于秉承始终不变的宗旨，不断更新和提高评价标准和内涵，在于与时代性的紧密结合。”许津荣在聆听代表发言后开宗明义：“对镇江而言，各级党组织能否带头跨越，争当排头兵，也正体现出各级党组织的时代性和代表性。”阐述了一番对“党的先进性在镇江的现体现”的理解，许津荣说：“实践表明，跨越发展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在比较中产生的。”

许津荣借着“科学思维×执行力×玩命干=新跨越”的方程式说，镇江要想争当排头兵，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要有奋勇争先的锐气，有创新突破的能力，有苦干、快干、拼命干的精神，还要善于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齐心协力一起干，“合肥的经验证明，勇气和锐气是赶超跨越不能缺少的。如果总是怕压力，习惯于现状和老习惯，不敢打破，甚至没有创新的胆识和智慧，就难以实现超常规的逆势跨越，坚持发展为民、发展富民、发展利民，凭借镇江跨越发展的实效书写彰显这个时代特征的辉煌篇章”。

——摘自《镇江新闻网》

焦点关注

“一票否决制”的副作用应尽快祛除

近日，《半月谈》刊登了一篇关于一票否决制异化现象的文章。文章指出，“一票否决制”在实施和执行过程被异化，产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副作用。比如，上级对下级实施多项指标“一票否决”，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为了不被追究，反而忽视淡化了真正的工作中心。而且“一票否决”还使一些政府部门自身权力膨胀，一旦某项工作被列入“一票否决”，就意味着相关职能部门多了一项可以“兴师问罪”的权力，更有甚者成为某些部门和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作为一种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管理模式，“一票否决”无论是在执行政策、选拔干部等重大问题上，还是在日常对具体工作管理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考核与评估的重要标尺乃至唯一标尺。尤其是在计划生育与信访这两项事务上，“一票否决制”更是达到了“巅峰”，其负面作用也最为明显。

由于实施“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是执行过度，为求不被否决而欺上瞒下，乃至采取专政手段对付生育人口；另一个极端是一票被否决后再无后顾之忧，索性利用计生政策敛财，甚至故意放任生育以求罚款。

“信访一票否决制”中发生的极端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防止工作成绩被个别上访事件而“一票否决”，不少基层政府打出了严防死守的旗号，不仅要通过开办各种学习班来“教育”上访群众，还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截访”。“信访一票否决制”的目的本来是化解基层矛盾，逼迫官员良好施政，结果却导致了基层工作难做，而且也不利于群众反映意见。

此外还有“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社会综合治理一票否决”、“环境保护一票否决”、“节能减排一票否决”、“招商引资一票否决”等等。但这些否决制的实践表明，依靠行政命令为主要方式的制度非但没能促进工作加强，反而招致地方工作弄虚作假现象的出现，乃至助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施政心理。这就是“一票否决制”的异化。

真正的“一票否决”，不该是上级对下级的否决，而是选民选票的一次性否决。工作没干好，选民把你选下去，干好了，再把你选上去，这才是更好的更灵活的“否决制”。

——摘自《半月谈》

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

如何看待、定位社会矛盾，这是比社会矛盾本身更重要的问题。制度不是死的，它也有思维，但和人的思维不一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都理解的一件事，“制度的思维”却可能无法理解。比如在“文革”时，一个人把毛主席的塑像摔坏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不小心，但是体制没有“不小心”一说。在体制中，你把毛主席的像摔了，就要接受处分。

前几年四川发生过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建一座电站占了耕地，产生了利益冲突，最后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一开始地方政府把事件看作农民武装暴动，处理时很僵硬，矛盾不断激化。后来中央进行了二次处理，给予了补偿，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因此，体制如何看待社会矛盾和冲突很重要。

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比如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的矛盾和冲突等。其实大多是利益的冲突，这是一种最理性的矛盾，但我们的定位往往有问题，习惯于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眼光看待矛盾冲突，因此在处理问题时政府的反应常常过大，精神高度紧张。

体制也像人一样，会拘谨。试想它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这样能处理好问题吗？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这话是从“足球评论”中来的——看中国足球，有时先输球后来还能扳回来，要是领先就完了，因为很少赢球，就搞得自己很紧张，到最后几分钟还能让人连灌几个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处于高度拘谨的状态。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时也一样，应该有平常心，有舒展的心态、舒展的灵魂。这种“舒展”来自准确的定位，只有定位准确才能正确地处理问题。

——摘自《同舟共济》

政府缺钱，宜向改革要出路

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下降13.6%，支出却增长了24.5%。给这种窘境做注脚的，是关于“四万亿”的一则消息：截至3月底，审计抽查的335个新增投资项目中，中央资金到位94%，地方有些配套资金到位却只有48%。大批项目逐渐开工，需要的后续资金只会更多。不仅如此，最近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确实，光是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就还有1.4万亿空账嗷嗷待哺。

一句话，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现在很缺钱。而且，在经济重新繁荣之前，这个缺口很可能越来越大。

加强税种征管的措施随即联翩出台，这种事实上的增税，在合法性上没问题，却可以更完善。毕竟，政府缺钱，并不是增加企业与民众负担的正当理由。企业和纳税人要过紧日子，政府也要过紧日子。这才符合现代税收国家的“支出正义”——财政困难时，第一个要削减的，应该是政府的行政支出。

因为如此，2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断要求党政机关三公消费零增长甚至削减开支。但若辅之以详细的财政信息公开，辅之以民众的依法问责通畅，效果可能会更显著。否则，如果政府的财政收支过于粗疏，预算内外究竟有多少钱、支出方向与明细等，很多都处于笼统或半保密状态，就会使得政府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缺钱，缺多少钱这些最基本的信息，公众都难以判断。

尤其是，对一个正在谋求现代定位的政府来说，直接而大规模的投资，似不应再成为其分内之事，要说缺钱，缺的也主要是建立社保体系及提供其他公共服务所需要的钱。

其实，增税而外也还有很多积极的选项。比如，既然地方没有足够的配套资金，何不顺水推舟，大大方方让民间资本有安全感地进来？民资进入垄断行业，是说了多年的老话题，但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地过。在煤炭、石油、石化、航空等领域，民资进去了又被非市场因素挤出来的案例，所在多有。

要破除这样的魔咒，最终的解决希望还是在政府自身。值得期待的是，从历史经验看，巨大的财政压力往往是大手笔改革的诱因。如果能选对改革路径，延续市场化逻辑，真正节制权力，借此为民资冲出一条血路，为民众的经济权利趟出一条大道，将是本轮危机留给中国的最重要遗产。

——摘自《南方周末》

政府有困难也找警察

“为了加大我县水土流失防治力度，决定由县公安局代表水利局征收水土流失防洪费。”这是湖南省溆浦县政府一份“县长会议纪要”中的话。

水利部门的事，要由公安局代办，看来征收是有难度。但如果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难处，是不是都要警察来帮忙？

滥用警力，暴露的不仅是有关部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更表明他们在执政理念上发生了偏差，视争取自己权利的群众为“刁民”和“暴民”，与群众形成对抗关系。在一些地方出现的突发、群体事件中，警察和群众造成的对立局面，多少都和当地政府滥用警力有关。

其实，只要防洪费收取合理，老百姓是会支持、配合的；改由公安部门强制收取，反而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抵制。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慎用乃至不用警力、慎用乃至不用警械、慎用乃至不用强制措施，应该成为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原则。

——摘自《中国青年报》

以欣赏的眼光看“29岁市长现象”

6月21日下午，湖北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任人民政府市长。据了解，以全票当选市长的周森锋今年29岁，系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新京报》6月22日）

周森峰，一个80后的年轻人当上了一个市的市长，据说还是湖北省最年轻的县市长。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人们除了一丝惊异之外，多数人还投之以羡慕的眼光。尤其对于在县以下长期工作在基层的同志而言，一辈子想当上个县级干部甬提有多难，更何况周森锋还是一个80后的年轻人，还30岁不到！

有年长的同志感叹说，人活了一大半辈子，在行政上混了几十年，还抵不过一个刚出学堂的80后的年轻人！还有人说，现在的干部政策变了，向年轻的干部倾斜，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也有人担忧，那些年轻人由于刚出学堂们不久，社会实践能力还欠缺，把他们提到一个县市的一把手位置，时机还不成熟……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必担心“29岁市长现象”。就拿周森锋来说，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经历了多个工作岗位，且在每一个岗位都表现“不俗”，作风扎实，深受群众喜爱。在市长选举过程中，他全票当选，这一切说明，他已基本具备了一位县市主要领导的能力和素质。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好苗子”，我们又何能不悉心“栽培”之？

领导干部的年轻化，是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的一个大方向。年轻，就意味着有知识、有文化、有活力，就意味着思想开放、责任心强、有敢闯敢试敢干精神，这一切只要利用好了，就可以变干部年轻的优势为发展的优势，从而推动工作开创性的开展。当然，干部也有干部成长的规律，我们也不可违背规律提拔使用干部。但这决不是说，干部“太年轻了”就不能使用。相反，只要干部成熟了一个，我们就大胆的使用一个，这既是干部选用过程中的一种求是态度，也是一种创新精神。

当然，“29岁市长”也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我想在今后的工作中会逐步解决的。但对于“29岁市长”，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它的积极一面，即在选人用人上，无论干部是何出身、年龄有多大，只要他们素质能力具备，我们就可以大胆使用之。

——摘自《光明日报》

可怕的“宁撞公交不撞奔驰”

6月11日下午，重庆市双碑石井坡车站红绿灯处，一辆刹车失灵的长安小货车眼见追尾不可避免，司机当机立断——猛打方向盘避开正前方的奔驰，而撞向了另一车道满载乘客的公交车。司机事后解释说“奔驰车我撞了赔不起”。（6月12日《重庆晚报》）

开奔驰的非富即贵，很多都是大人物，能不惹就不惹；坐公交的都是普通人、穷人，好对付。宁撞满车普通人、不惹一个“富贵人”，这就是某些人潜意识里的可怕逻辑。

假如司机遇到了无可退避的紧急关头，眼前一个城里人、一个（甚至几个）乡下人，他会选择撞谁？按照“宁撞公交不撞奔驰”的逻辑，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猛打方向盘，将车轮从乡下人的身上碾过去！同命不同价，一直是“中国特色”之一，比如前些日子出台的《广东省公安机关2009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项目计算标准》就规定，交通事故城镇居民最多能获赔76万多元，而农村居民则只有区区25万多元。人穷志短、命贱言轻，今后穷人是不是连门都不敢出了呢？

在利害的考量之下，奔驰和公交立时被分出了轻重，人的生命也成了可以随意取舍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种评判标准，怎不令人脊背上冒出丝丝凉意！更值得深思的是：是什么造就了“宁撞公交不撞奔驰”的可怕逻辑？是谁人为地制造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将把我们的社会带向何处？

——摘自《中国妇女报》

松原高考舞弊的警示

今年高考期间吉林松原市出现大规模严重舞弊的情况。在多个考点，不但一些考生用微型耳机接收信息，或公然传递试卷、抄袭答案，而且不少教师和考生家长也参与运筹策划。有教师组织学生购买作弊仪器，几天之内获利数十万元；有监考教师直接“帮忙传答案，或者放风，以免被巡视员撞见”。很多监考教师“不敢太深管”，否则走出考场就可能遭到报复；一些外地学生“慕”松原之名，费尽周折转到这里参加高考，一般都能多考几十分；当地一些成绩好、无需作弊也不想参与作弊的考生，如果不想在考场上被人打扰，必须事先交钱“买保护”……

似乎不能一味指责松原市有关方面对高考舞弊防范不严、打击不力，实际上他们对今年的高考“非常重视”，“成立了由教育、公安、电信等18个部门组成的高考委员会，主任是主管副市长，严抓高考舞弊”，但在如此高规格的严抓、严查之下，高考舞弊仍然禁而不绝愈演愈烈，并且出现了朝着组织化、产业化、准黑社会化方向发展的迹象。可以说，松原市今年的高考舞弊事件，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张扬形式和“彻底”程度，促使我们必须从更宽泛的层面诊断一些地方的社会病灶，正视一些地方“基础秩序”严重动摇的现实，并坚定地应对由此带来的严峻挑战。

基础秩序，主要包括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社会生态等内容。人们的自觉既来自制度的宣示作用、严刑峻法产生的威慑力，也来自长期道德建设从外界对个人内心形成的约束，甚至来自个人的坚定信仰。反之，如果基础秩序不稳定或者严重动摇，人们普遍缺少诚信、耻感、名誉感和尊严感，那么，制度措施再严密，法律法规再完备，热衷于钻制度漏洞、走法律捷径者也一定大有人在。松原高考舞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基础秩序严重动摇的典型标本——由于基础制度出了问题，高考招生制度在当地反复失效，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改善一个地方的基础秩序是一项长期、浩大的工程，必须从道德重建、人性教育、信用体系等基础环节做起，通过一点一滴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渐改善和形成一个足以支撑良好制度运行的

基础秩序。

——摘自《北京青年报》

神州扫描

河南欲将文化和旅游结成“并蒂莲”

距嵩山少林寺 7 公里的少室山待仙沟，原本是一个荒凉、险峻的峡谷，如今却成了一座禅乐回荡、中国山水画般的天然剧场。每晚在这里上演的大型山地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让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流连忘返。

无独有偶，在著名古都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内，通过挖掘和扶持皮影、女子马球、水上傀儡等众多传统民间表演艺术，汇集绣鞋坊、陶泥坊、汴绣等传统手工艺术，既增强了景区的吸引力，又使民族文化瑰宝得到传承发扬。

近年来，河南让文化和旅游结成好伴侣、穿上连体衣，成功推动了由旅游资源大省向全国旅游大省的转变。在最近确立实施的旅游立省战略中，河南再一次响亮地打出了“文化河南”的旅游品牌，提出要坚持不懈地把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植入旅游产业，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史前文化、神龙文化、圣贤文化、农耕文化、古都文化、姓氏文化、武术文化等共同构筑了中原文化的厚重、多元和经典，发展文化旅游优势十分突出。

但一直以来，人们却用“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来形容河南的旅游生活。如何把老祖宗留下的资源“亮”出来，吸引更多的陌生眼球，河南意识到，必须做好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让二者成为“并蒂莲花”。

“目前的问题是二者融合得还不够深、不够精，形成的世界级文化旅游品牌屈指可数。”河南省委政研室主任白建国指出，比如开封的宋文化、登封的少林文化和禅文化、淮阳的羲皇文化、禹州的钧瓷文化等都有待深入挖掘开发、包装推广。什么时候把河南厚重的中原文化开发成为受世人青睐的成熟的旅游文化产品，河南的旅游业才真正走上了康庄大道。

因此，大力推进文化资源旅游化和旅游资源文化化，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共同努力的目标。

河南的少林寺、龙门石窟、云台山、开封大宋文化旅游区、殷墟、鲁山大佛等景区，都是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河南已提出要按照国际标准抓紧进行规划建设，推动这些景区加快转型升级，形成产业集群，力争使之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目的地，成为引领河南旅游发展的王牌。

清明上河园一杆“包公秤”，上量名流贤士，下称黎民百姓，很受旅客的青睐，可以说小点子取得了大效益。“景点是不变的，变的是文化创意。不断的文化创意会给旅游带来不断的生机。”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何琳说，“文化靠旅游做大，旅游靠文化做强。让优秀的文化和优美风景相结合，表现河南的山、河南的水、河南的人、河南的情，从而对中国旅游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正成为文化和旅游界人士的共识。”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上海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所

6月15日，由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上海精文投资公司联合投资创立的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正式揭牌。

交易所成立后，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组织开展政策咨询、信息发布、项目推介、投资引导、并购策划、项目融资、产权交易等活动；运用产权交易方式和规范化的市场运作，推动各类所有制文化企业资产重组、跨国融资并购等；通过产权交易、信息披露、投融资服务等方式为各类文化产权主体提供定价、资本进出通道，探索创建文化金融体系的新途径。努力打造文化要素价值发现与实现的平台、文化要素流动的平台、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平台、文化与资本对接的平台以及海内外文化要素、资本融合的平台。

据了解，近年来，国内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由此催生了文化产权市场。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的成立是探索通过市场化发展文化产业的一次重要尝试，对文化产业自身的精细化、标准化、资本化、实体化发展有积极意义。

——摘自《中国文化报》

网坛一瞥

中国的“四十五岁现象”

中年是人生的黄金年龄，无论是体力、精力，还是智力、能力，都达到成就事业的巅峰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把 45 岁到 59 岁的年龄段界定为中年人，中华医学会也认同这个“中年人”的科学结论。

但在中国，相当部分中国人把 45 岁视为一个坎。到这个年龄仍当不了处级干部，或者是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者，就会有前途渺茫的感觉，不思进取，不求发展，开始思谋如何度过余生。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到了 45 岁还没被提拔，这辈子算完了。

“提拔”是与“当官”相关联的词，但官的数量有限，并不能承载所有人的理想，到 45 岁还从事专业、干具体工作的人，在中国一般被视为“混得不怎么样”，相当多人反而迷茫。而在国外，人上了 40 岁，绝大多数人进入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家庭稳定，对世态人生不再迷惑，专注于自己的专长，冲向“出成果”的高峰期。电视上、企业里、议会中，唱主角的人是那些稳重达练的中年人。

也有学者疾呼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但“45 岁”仍经常出现在文件上。2006 年中央组织部明文规定，担任县级党政正职的人要以 45 岁左右的为主体。刚刚发布的 2007 年全国机关官员统计显示，45 岁以下的占 71.5%，并赞扬选配好“新鲜血液”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举措，显然是要更加年轻化。而在较富政治活力的美国，2002 年公务员的平均年龄为 46 岁，45—69 岁之间的人超过半数。

独具特色的“45 岁现象”

将 45 岁作为人生的分水岭，且把这个年龄列为人事遴选的标准，恐怕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在西方社会，这会被视为年龄歧视；在上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人们更遵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自然规律。

“45 现象”是在公务员阶层率先兴起的。一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倡导的干部年轻化，本来是针对陈旧僵化的思想而言的，但却渐渐收拢在年龄这个“硬指标”上。另一方面，经济形态变化了，而官员角色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使得当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权有利。加上以“任命制”为主的官员选拔体制没多大改变，使得对上级领导的态度比业绩更具有晋升说服力。每换

一届领导，就会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年龄越来越年轻，“45岁”也便成为官员前途的关键一道坎。

于是，便出现高层领导习近平所指出的几种弊端：一些年轻官员在干部选拔上做不到“五湖四海”，听不得不同意见，喜任人唯亲；有的公开场合显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背后却在和小兄弟们吃喝玩乐；有的把生活作风当作“小事”，不检点不自律不自重；一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过于年轻特点，把他们当作“潜质股”加以“投资”。

而跨过45岁门槛的官员，有些人会享用来之不易的成果，有些人则十分小心地保全既得利益，“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成为官教条，使得整个官僚体系中的改革锐气下降，甚至连讲话都谨慎格外，常常抄袭总书记、总理的报告。而年轻一代也看到当官的种种好处，报考公务员成了中国的“金考”，竞争之强远超于高考。2008年平均竞争比例是60比1，2009年则上升为73比1，最优秀的人似乎都要进入官场。

正在向社会渗透

值得关注的是，“45岁现象”正在向社会各界渗透。渗透的表现之一是企业、大学的行政化，以便于套用或获取行政层级所赋予的特权。表现之二是企业 and 大学的人也将45岁视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坎，向中层管理者奋斗。这个年龄仍在一线从事实际业务的人，被普遍认作“没什么指望”的人，管人的似乎总比搞专业的要高人一等。

于是，45岁到60岁没有官职的人，成了最尴尬的一群。45岁以下，体力和精力好，但能力、经验可能不足，可当“新鲜血液”加以培养；60以上，工作能力强，但可能身体和精力差，需要退休。而既有精力又有能力的45到60岁的人，却被排除在县处级干部和中层管理者之外，搞专业又被社会所不齿，在人生的黄金时期“退居二线”，极大地浪费着人力资源。有人对这种现实发出过质疑：60多岁的人有精力处理好国家大事，50多岁的人难道就没有精力当好县乡领导？

“45岁现象”向社会渗透的结果是，很多人都想当官当领导，而把从事专业工作视为前途不大。45岁以上的记者很少活跃在现场，45岁以上的教授专心写教案的不多，45岁以上的工程师更多地当“老师”而不动手。唯独农民没有45岁概念，需要不断进取。

改革分配机制是关键

浪费社会人力资源，是“45岁现象”产出的不良后果之一。这种现象不能制止，会潜移默化地把很多人的成功路径引向当官小道上，相当多国家栋梁之才，可能把精力和智慧消耗在琢磨人

事安排上。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都与之有关。比如浮躁风气，与年轻干部和管理者年轻化无不关系。年轻人有活力，求新猎奇，但对一些“新事物”、“新创意”的警觉性、鉴别力不强，不免意气用事，急于求成。再如浮夸风气，由于提拔年龄卡得很紧，每个干部和管理者都以被“提拔”为主要目标，想尽快出政绩，不惜弄虚作假、牺牲环境、危害他人权利为代价，而对具体的、实在的利国利民的事业缺乏兴趣和耐心。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会影响人们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民间已有这样的流行话：“年龄是个宝，文凭很重要，关系最关键，能力作参考”。当真才实学被视为不重要的因素时，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靠什么建构？

这就需要认真思考“45岁现象”的成因。“官本位”传统，工作压力大需要年轻人支撑，高科技时代需要反应快捷的头脑去应对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官员选拔制度滞后，都是不能忽视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或许是分配体制上的优惠和特权。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还是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具有一定的特权，有令人羡慕的物质优待和很多看不见的获取利益的渠道，这就吸引人们竞奔行政队伍和管理者阶层，甚至作为理想追求。

而在一些民主法治国家，选举和监督让当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注重经济成本让中层管理者成为裁员的首选对象。他们对专业的人士的尊重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明白专业人士的脑和手，是机构和自己财富的来源，所以给专业人士较高的待遇，鼓励他们埋头苦干。成为专业人员，也便成了很多人的追求，安定且体面，在黄金般的中年期达到事业顶峰，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中国要减少“45岁现象”，从平衡实际收入差距和减少官员特权做起，也许是较便捷的入口。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张甫雄 责任编辑：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镇江市解放路17号

电话：84447365 邮编：212001

E-mail: zjtsgbk@126.com